

【论 文】

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主义思想的“三大争论”及评析¹

吕秀彬²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经常被视为处在“艰难的对话”之中。在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更看重国际主义的跨民族的横向阶级区分，认为民族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暂时产物。但在实践中，他们又利用民族主义的力量，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助力。从20世纪初到当代，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理论一共产生过三次比较大的争论，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有系统性的民族主义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是否为民族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思想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本文在梳理国外学界三大争论的基础上，试图重新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揭橥他们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变化的，并归纳出他们民族主义思想的四大支柱。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国外学界；三大争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从20世纪初一直到今天依旧是国外学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究其原因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是变动不居的，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是具有危险性、破坏性和排他性的理论，但又认可它能够用来推进国际主义事业，因此，他们在对待民族主义问题上的灵活性一直是贯穿始终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常常散见于大量的书籍、文章、信件、宣言和各种声明之中，因而可以说他们并没有留下系统的、全面的论述，也没有给民族或民族主义一个确切的定义，这些都让这份暧昧的遗产的讨论空间增大了。

一、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有无系统性民族主义观点的争论

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有系统性的民族主义观点一直是国外学界争论的焦点，总结来说形成了如下三个派别：第一，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民族主义思想，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理论中并没有包含民族认同的内容；第二，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有民族主义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一定的系统，不过是革命策略罢了；第三，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有系统的民族主义思想，并建构出了一个逻辑体系。这一部分，我们将会对这三种观点进行逐一的探析。汤姆·奈恩（Tom Nairn）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民族主义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伟大的历史失败。它可能也有其他的问题，有些已经引起了很多争论……然而，没有一个比民族主义问题更重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上。”³ 这类观点在国外学术界比较常见，反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都有人涉及。反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从“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入手进行攻击，尤其是冷战之后社会主义阵营面临一定政治困境，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所遗留的问题，让这些学者将原因追溯到马克思对民族主义问题的低估，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甚至将共产主义的历史称作“讹告”⁴。这事实上制造了一种混乱，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思潮和现实来歪曲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内容与动机。安德里亚·格拉齐奥西（Andrea Graziosi）就曾指出：“简单地将两者对立起来是不准确的，因为它们之间有许

¹ 本文刊载于《世界民族》2021年第4期，第1-14页。

² 作者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³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1, p. 329.

⁴ 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p. IX.



多互相借用和各种各样的混合，而共产主义在 20 世纪民族解放运动中起着关键作用。”¹

非马克思主义者唐纳德·N·莱文 (Donald N. Levine) 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拒绝民族主义的²，在他看来《共产党宣言》中很明确地剥夺了无产阶级的“民族特征”，“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³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波兰和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表示过同情，“但可以公平地说，马克思在他对未来的预测中几乎没有给民族主义情绪留下空间”⁴。莱文引用了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 的话作为结论：“马克思系统地低估了民族主义、宗教和种族团结等非理性力量的影响”⁵，因而，马克思展现出一种对民族问题解释的“特殊的无能性”⁶。对此，凯文·B·安德森 (Kevin B. Anderson) 评价道：“虽然莱文对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批评，但由于没有更多地吸收马克思关于这些相关主题的著作，这种批判被削弱了。”⁷ 安德森在其著作《边缘地带的马克思：论民族主义、族群和非西方社会》(2010) 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作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⁸。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有民族主义思想。罗纳尔多·蒙克 (Ronaldo Munck) 试图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中更新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处在一个艰难的对话状态⁹，并断言：“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没有民族主义理论”¹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声称是一种为人类解放谋划道路的意识形态，但却在理解民族主义上有着“独特的困难”¹¹，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现象的研究贡献甚微。后马克思主义者厄内斯特·拉克劳 (Ernesto Laclau) 也认为马克思不认可“民族认同的独特性和不可还原性 (irreducibility)”¹²。埃里克·本纳 (Erica Benner) 认为如果不承认已经成为事实的民族主义，将会让马克思主义丧失解释力。¹³ 她在《现实存在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后共产主义视角》重新思考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区分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反对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观上的无知。¹⁴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得到了一部分学者的承认，但被看作是“不系统”“不完

¹ Andrea Graziosi, “Commun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Silvio Pons, Stephen A. Smith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ommunism* (volume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449.

² 赵凯荣持有与莱文相似的观点，认为对马克思来说，民族问题不重要，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单一民族的消亡对马克思而言并没有什么值得伤感的。参见赵凯荣：《马克思主义：如何面对民族主义？——马克思、列宁、卢森堡相关思想的分歧及其当代意义》，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6 年第 1 期。

³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42 页。

⁴ Donald N. Levine, *Visions of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227.

⁵ Donald N. Levine, *Visions of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229.

⁶ Donald N. Levine, *Visions of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229.

⁷ Kevin B. Anderson, “Levine on the Marxian Tradition: From Idealist Roots to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42,

⁸ 详见 Kevin B. Anderson, *Marx at the Margins: On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Non-Western Societ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在该书中安德森对马克思、恩格斯散落在书信、文章等角落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按照不同民族问题和不同时间段进行了分类，他重点分析了波兰、爱尔兰、俄国的民族问题，除此之外，还关注了犹太人、美国黑人等种族问题和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等东方社会的殖民问题，并将马克思视作“全球理论家”。

⁹ 参见张三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困难对话论”评析》(上)，载《世界民族》2014 年第 3 期；张三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困难对话论”评析》(下)，载《世界民族》2014 年第 4 期。张三南在这两篇文章中讨论了蒙克的“困难对话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并非是非决然对立的，他从人类解放这一“长时段和大理论”视角以及无产阶级对待民族主义的“两重性”入手进行分析，指出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可以实现良性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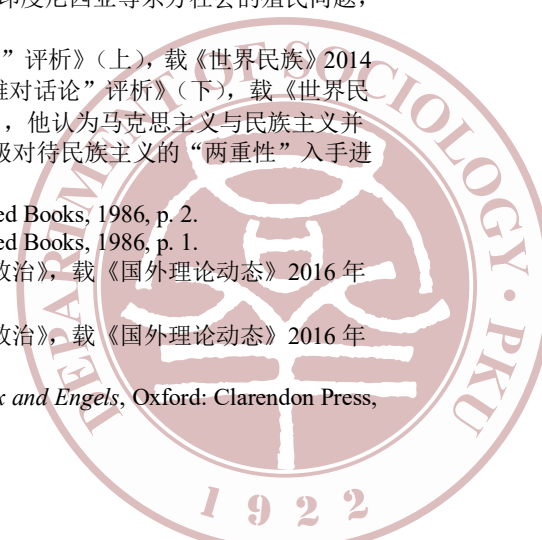
¹⁰ Ronaldo Munck, *The Difficult Dialogue: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London: Zed Books, 1986, p. 2.

¹¹ Ronaldo Munck, *The Difficult Dialogue: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London: Zed Books, 1986, p. 1.

¹² (美) 麦克·戴维斯著，罗雪芳译：《马克思遗失的理论——民族主义的政治》，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 年第 11 期。

¹³ (美) 麦克·戴维斯著，罗雪芳译：《马克思遗失的理论——民族主义的政治》，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 年第 11 期。

¹⁴ Erica Benner, *Really Existing Nationalisms: A Post-Communist View from Marx and Enge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善”“不连贯”的政治革命策略。迈克尔·洛维（Michael Löwy）指出：“马克思既没有提出系统的民族理论，也没有对‘民族’概念作出准确的解释，更没有为无产阶级在这一领域提供一个总体的政治策略。”¹因此，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一问题的大部分文本都是与具体事件相关的政治声明。对此，韩国学者林志弦（Jie-Hyun Lim）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的低估，“马克思对实际民族主义运动的表述也不能纯粹从政治角度来分析”²。贺拉斯·B·戴维斯（Horace B. Davis）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态度是不稳定的，“当民族主义情绪被纳入一个有价值的事业中时，它就成了一个有利的形容词。另一方面，当民族主义情绪阻碍进步时，它就会被当作‘偏见’而不予理会，或者加上‘狭隘’这样的修饰语。”³。例如，马克思在讨论英、法工农对克里米亚战争的态度时，“无论英国无产者还是法国无产者都充满着崇高的民族感情，不过他们或多或少摆脱了两国农民所固有的陈旧的民族偏见。”⁴米哈尔·卡斯普扎克（Michal Kasprzak）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波兰的论述呈现出“矛盾性”。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全心全意支持波兰独立，但到了50年代，恩格斯强烈反对波兰独立，认为其注定被俄国和德国吞并，60年代后恩格斯再次呼吁波兰独立。“这种分歧甚至矛盾的观点只会他们的学生和敌人之间引起混乱。”⁵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思想也被部分学者用一个“框架”含蓄地塑造成一个体系。伊弗雷姆·尼姆尼（Ephraim Nimni）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思想虽然是不同历史时期对民族问题的不同解读，但存在一个“潜在的范式”，他称之为三个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概念，即进化论；生产力的经济决定论；以及两者的衍生范畴，具体案例分析中的欧洲中心主义⁶。尼姆尼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以法国为蓝本，坚持对大中央集权国家的偏爱，如果民族主义运动代表着生产力的更高阶段，用来废除封建制度，“那么民族主义运动作为社会进步变革的‘工具’值得支持”，但如果民族主义运动出现在一个弱小文化群体中，“民族主义运动就变成了一种‘退步’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不能构成‘适当的民族国家’的民族共同体应该被更‘进步’和‘有活力’的民族同化而消失”⁷。林志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思想有完整的理论框架，即唯物史观——资本中心论；理论联系——帝国主义和历史发展的多元线性观；现象分析——马克思关于民族问题的新闻类作品⁸。与洛维的政治主义和尼姆尼的经济主义不同的是，林志弦将二者结合起来，从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入手进行考察，他认为：“从形式经济角度看是错误的，但从普遍历史观点来看可能是正确的。”⁹民族主义不能单纯以“资本中心”来判断，这样会低估了欠发达国家民族主义的潜力。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因为“还原论”（reductionism）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在分析爱尔兰民族问题时已经成功地摆脱了。

国外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所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做出如下评析：第一，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主义思想的前后矛盾性？诚如卡斯普扎克所言，“马克

1995.

¹ Michael Löwy, “Marxist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New Left Review*, Vol. 96, No. 4, 1976.

² Jie-Hyun Lim, “Marx’s Theory of Imperialism and the Irish National Question”, *Science & Society*, Vol. 56, No. 2, 1992.

³ Horace B. Davis, “Nations, Colonies and Social Classes: The Position of Marx and Engels”, *Science & Society*, Vol. 29, No. 1, 1965.

⁴ 马克思：《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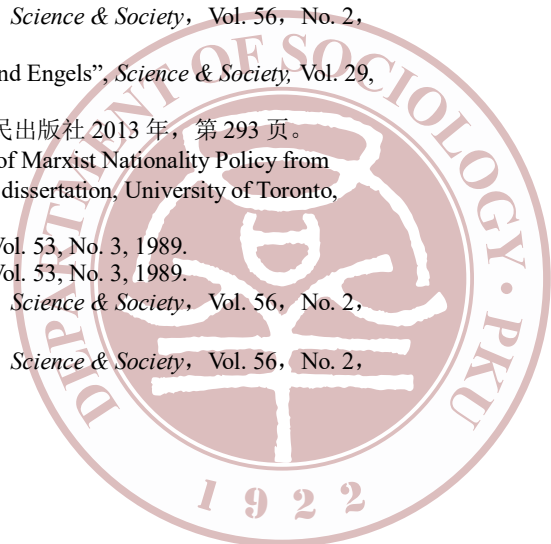
⁵ 详见 Michal Kasprzak,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rxist Nationality Policy from Marx and Engels to Lenin and the Communist Workers’ Party of Polan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2, p.23.

⁶ Ephraim Nimni, “Marx, Engel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Science & Society*, Vol. 53, No. 3, 1989.

⁷ Ephraim Nimni, “Marx, Engel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Science & Society*, Vol. 53, No. 3, 1989.

⁸ Jie-Hyun Lim, “Marx’s Theory of Imperialism and the Irish National Question”, *Science & Society*, Vol. 56, No. 2, 1992.

⁹ Jie-Hyun Lim, “Marx’s Theory of Imperialism and the Irish National Question”, *Science & Society*, Vol. 56, No. 2, 1992.



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不是僵化的，而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而演变的”¹。1848年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应对的是德国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现代国家和自由主义的环境，对狭隘、保守和自私自利的民族主义的批判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1848年的“民族之春”（Spring of Nations），让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一方面，他们积极利用民族运动达成阶级斗争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受激进主义的影响，恩格斯做出了一些主观的判断。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重新评估了民族主义力量，修正了民族主义的部分观点，并保持与国际工人阶级利益之间的平衡。正如费舍尔（V. C. Fišera）等所言就算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理论上的主张或思想连续性，也有一种逻辑和演变反映了作家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态度”²。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时期对民族主义有不同态度，这是由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多面性”决定的。³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就曾指出，“民族主义是一个最矛盾的政治术语，它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内涵；‘民族主义’这个词可以是褒义的，也可以是贬义的和中性的。”⁴民族主义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也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很容易就会受到其傲慢和排外倾向的影响，因此它是一朵带刺的玫瑰。第三，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思想究竟应当从何种维度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并没有着重强调民族主义这种情感或意识形态，甚至一度认为它作为资本主义的暂时产物将会消失，但他们并没有小觑民族主义的动员能力，本纳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远不是民族主义的结构或经济先决条件，而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战略所具有的极强的吸引力和革命性，它为通往共产主义提供了重要支撑⁵。诚如阿格拉瓦尔（N. N. Agrwal）所言，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民族主义问题，“同对待其他一切问题一样，都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社会主义革命利益出发的。”⁶这是我们理解他们民族主义思想的前提。⁷

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民族主义盛行的19世纪，受到民族主义力量的影响不足为奇，但马克思、恩格斯是不是民族主义者呢？国外学界对这一问题展开了争论，其焦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青年恩格斯的“非历史民族”（Geschichtlosen Völker）理论，以及由此引出的另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有没有统一的态度？

国外部分学者将马克思、恩格斯视为“披着社会主义服装的民族主义者”⁸。利亚·格林菲

¹ Michal Kasprzak,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rxist Nationality Policy from Marx and Engels to Lenin and the Communist Workers’ Party of Polan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2, p. 17.

² V. C. Fišera, and G Minnerup, “Marx, Engel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Eric Cahm and Vladimir Claude Fišera (ed.) *Socialism and Nationalism* (Volume One), Nottingham: Spokesman, 1978, p. 6.

³ 参见（以色列）耶尔·塔米尔著，陶东风译：《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所谓中性或温和的民族主义又被称作“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指在培养民族情感时，不忽视民族主义理念必须兼顾的其他人类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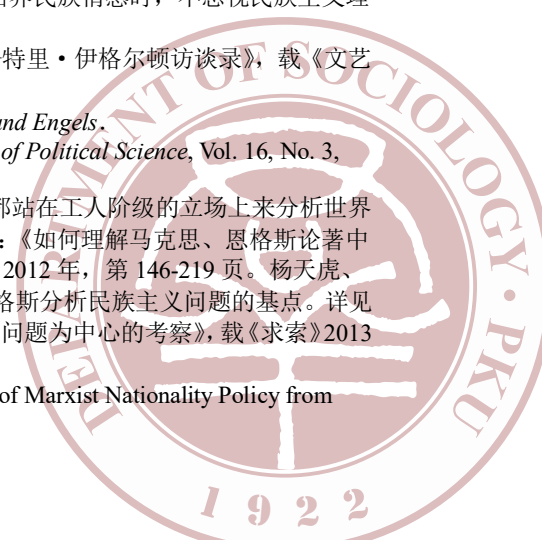
⁴ 详见王杰、徐方赋：《“我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12期。

⁵ Erica Benner, *Really Existing Nationalism: A Post-Communist View from Marx and Engels*.

⁶ N. N. Agrwal, “Marx and Engel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The In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No. 3, 1955.

⁷ 马戎等持有与阿格拉瓦尔相似的观点，他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始至终都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分析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问题，他们的基本立场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详见马戎：《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载《中国学术》（总第32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46-219页。杨天虎、陈燕认为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民族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民族主义问题的基点。详见杨天虎、陈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主义观的承续与发展——以爱尔兰问题为中心的考察》，载《求索》2013年第9期。

⁸ 参考 Michal Kasprzak,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rxist Nationality Policy from



尔德 (Liah Greenfeld) 就认为马克思生长在德国浪漫主义时代, “他完全继承了民族主义的态度, 但是却完全没有意识到……”, “德国沙文主义对他来说并不陌生”¹。伯特伦·沃尔夫 (Bertram Wolfe) 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革命民族主义者, 因为 “从 1848 年起, 无论大事小事,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倾向于从统一的大德国的角度来判断其他国家的权利以及欧洲的民族运动和革命”²。这些都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民族主义的倾向。本纳则坚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确利用了民族主义的动员力量, 并反对民族沙文主义, 但 “称他们为民族主义者是没有道理的夸大”³。而贺拉斯·B·戴维斯则持一种 “无意识的民族主义”⁴ 观点, 即马克思、恩格斯都曾被 “放逐”, 因此不受民族主义倾向影响, 但他们在潜意识里还是称赞德国。

为何马克思、恩格斯会被视为 “民族主义者” 呢? 罗伯特·韦尔 (Robert X. Ware) 分析其原因时说: “人们很容易认为, 鉴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某些较小或 ‘欠发达’ 民族的轻蔑甚至鄙视的言论, 他们对民族主义几乎没有耐心。当然, 一个民族主义者并不一定要赞扬每一个民族或民族运动, 但马克思, 甚至恩格斯更是如此, 对许多有抱负的民族特别贬损, 对民族压迫似乎毫不关心。”⁵ 恩格斯在分析 “泛斯拉夫主义运动” 时, 将斯拉夫民族视为 “非历史的、反革命的、毫无生命力的民族”⁶, 他认为像斯拉夫民族这样反动又没有生命力的民族是 “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由于异族的压迫才被强迫提高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民族, 是没有生命力的, 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什么独立的。”⁷ 它们的命运只能是 “革命恐怖主义”⁸。国外学界对此有三种态度: 一是, “非历史民族” 理论是恩格斯受到激进民族主义影响而产生的理论, 因此, 应当将他看作 “德国民族主义者”; 二是, “非历史民族” 理论与马克思无关, 所罗门·弗兰克·布鲁姆 (Solomon Frank Bloom) 曾指出马克思 “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甚至不是一个沙文主义者”⁹, 恩佐·特拉维索 (Enzo Traverso) 和洛维也认为 “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同意或不同意 (或不愿意采取) 这一理论: 事实是他没有在其著作中使用它”¹⁰。三是, 将马克思、恩格斯一同视作 “民族主义者”, 因为 “马克思、恩格斯在密切协作、共同革命工作的情况下, 在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会有分歧, 这是不可想象的”¹¹。

尼姆尼坚持马克思、恩格斯都是 “民族主义者”, 因为他们都对弱小民族 “不耐烦、不宽容”, 例如 “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 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¹²; “西班牙人已经退化了。但退化了的西班牙

Marx and Engels to Lenin and the Communist Workers' Party of Polan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2, pp. 23-24.

¹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Two Forces or One?” *Survey*, Vol. 29, No.3, 1985.

² Bertram D. Wolfe,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Marx and Engels”, *The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17, No. 4, 1958.

³ Michal Kasprzak,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rxist Nationality Policy from Marx and Engels to Lenin and the Communist Workers' Party of Polan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2, p. 24.

⁴ 详见 Horace B. Davis, *Nationalism & Socialism: Marxist and Labor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to 1917*,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p. 18.

⁵ Robert X. Ware, *Marx on Emancipation and Socialist Goals Retrieving Marx for the Fu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130.

⁶ 文中, 斯拉夫民族指俄罗斯人、波兰人之外没有建立自己国家、人口规模较小的分支, 分布在东欧、东南欧地区, 比如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国。恩格斯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等著作中论及斯拉夫民族问题。

⁷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2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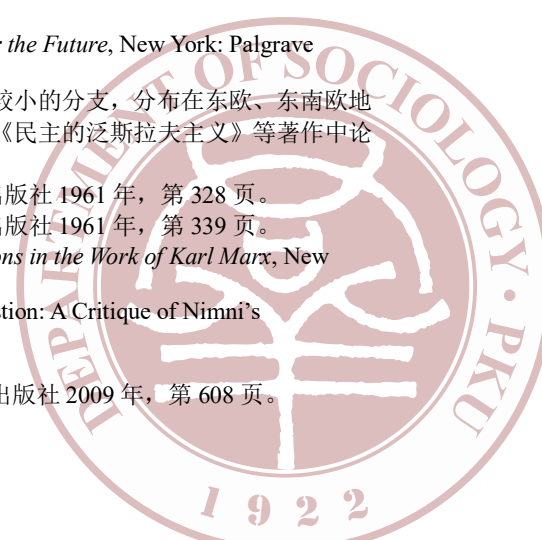
⁸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39页。

⁹ Solomon Frank Bloom, *The World of Nations: A Study of the National Implications in the Work of Karl Marx*,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1, p. 185.

¹⁰ Enzo Traverso and Michael Lowy, “The Marxist Approach to the National Question: A Critique of Nimni's Interpretation”, *Science & Society*, Vol. 54, No. 2, 1990.

¹¹ Ephraim Nimni, “Marx, Engel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¹²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8页。



牙人，即墨西哥人，也是一种典型。西班牙人的种种恶习、吹牛、空谈和唐·吉珂德精神在他们那里都自乘了三次……”¹；“贝都英人的斗争是无望之举……征服阿尔及利亚，对于文明的进展却是有意义的和值得庆幸的事”²；“斯堪的那维亚主义的含义是：歌颂残酷、粗暴和海盗式的古诺曼人的性格”³。尼姆尼认为这体现了一种僵化的、教条化的社会进化普遍规律规定的结果，它定义了“现代民族”应该存在的历史状态，并在默认的情况下，以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政治标准来判定“落后民族”。特拉维索和洛维不同意尼姆尼的观点，他们认为尼姆尼指出的马克思对中国人、西班牙人和墨西哥人的负面评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少数民族’……西班牙人在地理和历史都不是一个‘小的’或‘非西方的’民族”⁴。此外，马克思非但没有“贬损”中国，还正确预测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的关系⁵。他们认为马克思确实在19世纪中叶对斯拉夫民族作出过一些负面评价，但绝不是“欧洲中心主义进化论”，这是因为斯拉夫民族在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表现出了强烈的亲俄倾向⁶，而沙皇俄国在当时是反革命势力的堡垒，马克思担心泛民族主义转移无产阶级革命视野，成为俄国民族沙文主义侵略和吞并的工具⁷。在俄国1858年出现革命的废奴运动后，马克思的负面言辞就完全消失了。

为何恩格斯会得出“非历史民族”的判断呢？乌克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认为这一理论有黑格尔历史观根源，黑格尔曾在《精神哲学》中指出：“一个没有构成国家的民族……严格地说，没有任何历史，像国家崛起之前的民族和其他仍处于野蛮状态的民族一样。”⁸黑格尔将这样的民族称呼为“民族的残余”，这样的民族唯一的命运就是服从其他民族，最终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只有那些有自然和精神能力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治制度，帮助他们在国内外实现自己意愿的民族才是历史进步的承担者。这些观点都被恩格斯采纳⁹，罗斯多尔斯基对此表示不解，因为它“与恩格斯自己创造的唯物史观相矛盾”¹⁰。黑格尔的观点是明显带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意味的，“非历史民族”不是从不断变化的民族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关系中得出民族斗争和民族运动的本质，而是从它过去的历史中寻求“民族生存能力”的标准。罗斯多尔斯基认为恩格斯可能过于强调历史的因素了，而没有给“非历史民族”提供发展的机会¹¹。同时，虽然恩格斯对“非历史民族”有负面评价，但这是因为他想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甚至

¹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12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5页。

² 恩格斯：《惊人的揭露。——阿卜杜尔-卡迪尔。——基佐的外交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03页。

³ 恩格斯：《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64页。

⁴ Enzo Traverso and Michael Löwy, “The Marxist Approach to the National Question: A Critique of Nimni’s Interpretation”.

⁵ 参见叶险明：《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叶险明在该文中从多个角度阐明了马克思并非“欧洲中心主义”者，实际上马克思完成了对民族中心主义的超越。

⁶ 参见19世纪中叶斯洛伐克革命家卢多维特·斯特（Ludovít Štur）在其著作《斯拉夫王国与未来世界》（*Slavdom and the World of the Future*）中认为俄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斯拉夫民族，将斯拉夫民族比喻成“树杈”，俄国是“树干”，希望斯洛伐克被俄国吞并。

⁷ 详见 Kevin B. Anderson, *Marx at the Margins: On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Non-Western Societies*, pp. 47-50. 安德森认为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俄国的负面评价（主要见其著作《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方面是俄国的专制性使其成为反革命力量，因而需要对其严肃批判；另一方面，马克思没有屈从于民族中心主义，但以一种单向的、居高临下的方式描写俄国及其人民。

⁸ Hegel,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4, pp. 275-276.

⁹ 详见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02页。恩格斯在一系列描述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文章中，将那些“被历史进程无情地蹂躏”的民族称呼为“残存的民族”，认为他们每次都是反革命的狂热代表。

¹⁰ Roman Rosdolsky, *Engels and the “Nonhistoric” Peoples: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Revolution of 1848*, Glasgow: Critique Books, 1987, p. 128.

¹¹ 罗斯多尔斯基认为在当时根本“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民族注定要灭亡”，他认为恩格斯的理论中的矛盾是：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政治独立和民族自决；另一方面是，“历史生存能力”问题关系到这些民族的未来。详见 Roman Rosdolsky, *Engels and the “Nonhistoric” Peoples: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Revolution of 1848*,



过于“着急”了，他想“废除所有的‘特殊主义’，将欧洲人口融合成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单位……任何威胁……‘集中’而支持‘特殊主义’的东西，都必须被当作反动的和‘反历史’的加以拒绝”¹。

恩格斯正确地分析了19世纪中叶斯拉夫民族文明发展的参差不齐和语言不通的现状，他认为奥地利斯拉夫人要建立民族国家就必须摆脱纯粹农民民族的现状，发展出自身的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否则即便是独立了，也会被德国资产阶级窃取果实²。但恩格斯混淆了在语言文化上追求民族团结与进步，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泛斯拉夫主义”与政治上要求俄国通过吞并等手段统一所有斯拉夫人的反动的“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而对所有斯拉夫人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抱有排斥态度。正如罗斯多尔斯基所言：“1848年及以后的奥地利斯拉夫人决不是为了建立一个从亚得里亚海到巨人山脉的统一的斯拉夫国家；相反，他们遵循‘健康的’民族利己主义，只为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努力。”³ 特拉维索和洛维分析了罗斯多尔斯基的观点，认为斯拉夫的农民民族（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罗马尼亚人等）有形成自身民族认同和参加革命的意愿，但德国和马扎尔贵族和士绅并不给他们土地改革的机会，反而将他们推向了沙皇俄国的反动阵营⁴。恩格斯没有根据革命现实和阶级状况，而单纯的以“民族生命力”为基础做判断是违背辩证法的。但随着恩格斯摆脱理想主义历史观的束缚之后，他对爱尔兰全国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即芬尼亚运动⁵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因此，“‘非历史民族’的理论看来是完全错误和无用的，但这并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一个好理由。”⁶

约翰·霍夫曼（John Hoffman）和恩苏马洛·姆扎拉（Nxumalo Mzala）也认为不应当将这一理论“抽象和固定为民族问题上的某种原则性或纲领性的政策，也不能把马克思钉在还原论的十字架上”⁷，而是应当在一个总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全面的评价。在他们看来，恩格斯“并没有否认斯拉夫人（例如，捷克人）在其他情况下的民族独立权利，也没有排除如果斯拉夫人与革命斗争认同，他们可能‘重新建立’自己的‘生存能力’”⁸。他们指出恩格斯犯了和尼姆尼一样的错误，即将民族地位当作抽象和绝对的东西，而并非将其看作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民族通过不同的方式自愿融合而出现。恩格斯为何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他们认为恩格斯从唯心主义挣脱出来，在主张一种新的唯物主义观点时，“这根棍子，就像它曾经那样，被弯曲得太远了”⁹。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面对自己的对手时，必须用一种相当还原的方式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必须将这种抽象的理论和他们运用的具体方式区别开来。

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民族主义问题的视野有所不同，国外许多学者，包括贺拉斯·B. 戴维斯、罗斯多尔斯基、沃尔克·康纳（Walker Connor）等认为恩格斯受到民族主义运

Glasgow: Critique Books, 1987, p. 133.

¹ Roman Rosdolsky, *Engels and the “Nonhistoric” Peoples: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Revolution of 1848*, Glasgow: Critique Books, 1987, p. 129-130.

² Roman Rosdolsky, *Engels and the “Nonhistoric” Peoples: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Revolution of 1848*, Glasgow: Critique Books, 1987, p. 140.

³ Roman Rosdolsky, *Engels and the “Nonhistoric” Peoples: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Revolution of 1848*, Glasgow: Critique Books, 1987, p. 139.

⁴ Enzo Traverso and Michael Löwy, “The Marxist Approach to the National Question: A Critique of Nimni’s Interpret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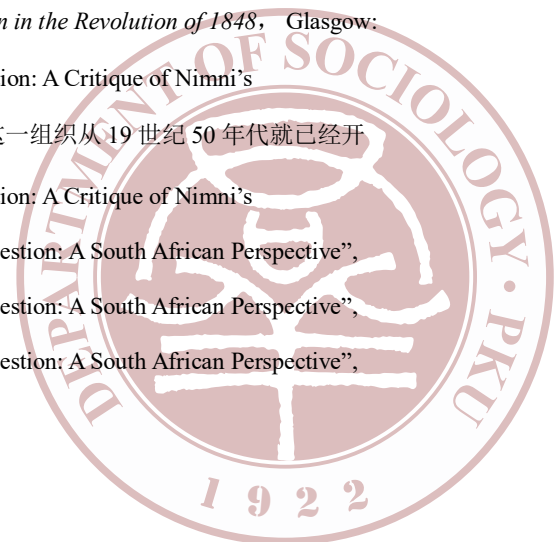
⁵ 芬尼亚（Denian）是芬尼兄弟会和爱尔兰共和党兄弟会（IRB）的总称，这一组织从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活动，主张爱尔兰人反对英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

⁶ Enzo Traverso and Michael Löwy, “The Marxist Approach to the National Question: A Critique of Nimni’s Interpretation”.

⁷ John Hoffman and Nxumalo Mzala, “Non-Historic Nation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A South African Perspective”, *Science & Society*, Vol. 54, No. 4, 1990/1991.

⁸ John Hoffman and Nxumalo Mzala, “Non-Historic Nation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A South African Perspective”, *Science & Society*, Vol. 54, No. 4, 1990/1991.

⁹ John Hoffman and Nxumalo Mzala, “Non-Historic Nation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A South African Perspective”, *Science & Society*, Vol. 54, No. 4, 1990/1991.



动的冲击更为直接和明显，恩格斯有一些独有的民族原则，例如“非历史民族”理论等。贺拉斯·B·戴维斯认为：“恩格斯年轻时是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尽管他努力保持国际主义的观点，但他后来曾多次使用民族主义术语。”¹ 康纳就直接指出：“在这两个人中，恩格斯受到民族运动高涨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² 埃德蒙·威尔逊则认为：“恩格斯的伴侣玛丽·白恩士是一个极端爱尔兰爱国主义者，这刺激了青年恩格斯的革命热情。”³ 与恩格斯相比，马克思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则没有那么深，在处理民族主义问题时能保持相对客观。青年恩格斯对民族问题的探索虽然曾出现失误，但也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的珍贵探索，到后来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1866）⁴一文中恩格斯已经能熟练地运用民族原则分析民族主义问题，因此，将恩格斯视为“民族沙文主义者”是有失公允的，从总体上看，马克思、恩格斯最终都是为了消除民族偏见、不平等和各种制度化障碍。总之，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往往需要从一个全局的高度去把握，尽量避免从他们的某段语句或者某种观点入手，不要忽视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的考察，避免得出“盲人摸象”一般的结论。

国外学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引申出如下问题，我们展开进一步剖析：第一，如何评价青年恩格斯的“非历史民族”理论？⁵ 笔者认为，要将恩格斯的这一理论放在“总的历史背景下”全面评价，虽然恩格斯曾有绝对化和抽象化的失误，对民族主义运动过于理想主义，对沙皇俄国的反动性估计得过于严重，但应该看到，尤其以他对待爱尔兰“芬尼亚民族运动”为证，他思想中包含了辩证性，修正了当初的抽象的理解，并放弃了“非历史民族”的观点。第二，如何看待青年恩格斯所受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19世纪欧洲两股民族主义力量，“以法国启蒙思想为代表的政治民族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以德国浪漫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民族的哲学基础是‘整体主义’（holisme）”⁶。恩格斯将法国的启蒙主义与德国的排他民族主义杂糅在一起，加上受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的“革命恐怖主义”思想的影响，一度激进主义占据上风，表现出狂热、进步的民族主义倾向是可以理解的，青年恩格斯的激进情绪在马克思的帮助下和与赫斯分道扬镳之后逐渐消失殆尽⁷。第三，如何看待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的民族主义情感的差异？这可能与马克思的理性主义更强有关，他迫于普鲁士当局的压迫和驱逐而放弃了普鲁士国籍，以“世界居民”自称，虽然后来马克思曾多次想要恢复其国籍，但并未成功。据此，也不宜夸大二人之间的差异，他们在革命热情中的价值超越一切意见上的分歧。

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关系的争论

正如康纳所说“马克思主义”（倡导“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哲学上是不相容的，

¹ Horace B. Davis, *Nationalism & Socialism: Marxist and Labor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to 1917*, p. 46.

² Walker Connor,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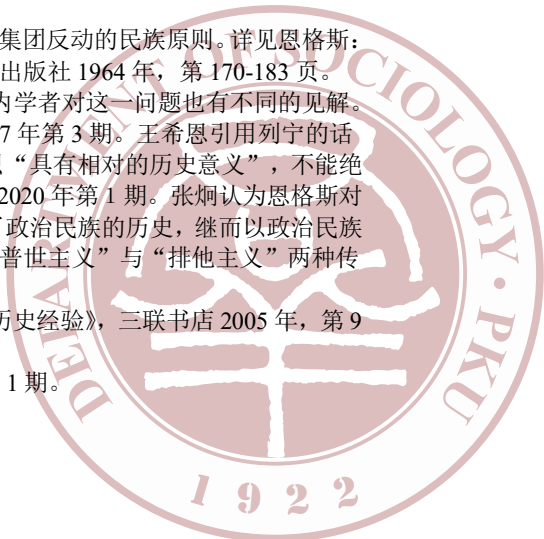
³ (美)埃德蒙·威尔逊著，刘森尧译：《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3-124页。

⁴ 文中恩格斯既批判了普鲁东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虚无主义，也批判了波拿巴集团反动的民族原则。详见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0-183页。

⁵ 除了罗斯多尔斯基“黑格尔根源论”、安德森等的“忌惮俄国论”之外，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见解。参见王希恩：《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观》，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王希恩引用列宁的话语，对恩格斯将波兰人视为“非历史民族”做出了解释，他认为这个问题只“具有相对的历史意义”，不能绝对化。又见张炯：《论1848年革命时期恩格斯的民族观》，载《现代哲学》2020年第1期。张炯认为恩格斯对两种“民族主义”传统，即文化和政治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杂糅，他只看到了政治民族的历史，继而以政治民族的历史强行覆盖文化民族的历史。张炯认为至少在1848年恩格斯身上有“普世主义”与“排他主义”两种传统，这两种情感的杂糅也是重要原因。

⁶ (法)吉尔·德拉诺瓦著，郑文彬、洪晖译：《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基础与历史经验》，三联书店2005年，第9页。

⁷ 参见张炯：《论1848年革命时期恩格斯的民族观》，载《现代哲学》2020年第1期。



因为民族主义从纵向上将人们划分为“不同族群”，而国际主义建立在“跨民族群体的横向阶级区分上”¹。国外学界就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是否相容展开了一场争论。

康纳认为民族主义者坚持民族意识要比阶级意识更为忠诚和强大，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坚持民族无产阶级相互连接为一个纽带，比共同的民族地位更重要，历史会证明国际主义将最终战胜民族主义。列宁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它是‘公正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国际主义代替一切民族主义……”²。对此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大卫·费利克（David Felix）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倾向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指出：“马克思的国际战略不仅容忍而且有意识地使用民族主义，这并不奇怪。任何具体的决定都取决于他如何在他的总体计划‘国际主义革命’的背景下定位和管理民族主义的某一方面。”³本纳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意识到民族主义潜在的负面影响，并试图对他们发出警告，而并非排斥民族主义，她指出：“马克思并没有否认与民族性相关的某些人口和文化特征的跨国界的韧性。”⁴韦尔也指出：“马克思当然是国际主义者，但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民族作为无产阶级的祖国是重要的。”⁵

可以说，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诞生于同一时代，才让两者之间虽然在哲学假设上是矛盾的但依旧能够产生亲密的互动。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性质让马克思主义者将民族主义视为历史发展中的敌对力量，这种情况在1848年以前比较常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主义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只是“虚幻的共同体”，人民并没有得到解放，再加上普鲁士政府的审查制度对新闻自由的限制让青年马克思十分排斥民族主义；第二，马克思对李斯特保护主义形式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倡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自由贸易⁶；第三，以鲍威尔兄弟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哲学”，对德国“精神”极度夸大，将自己脱离现实的纯思辨的学说赋予了“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价值，炫耀自己的学说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性，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⁷。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对消极的民族主义持一种排斥态度，不过“这仅仅是这两种主义历史关系的一部分，也许是最不耐人寻味的部分”⁸。到19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了东方民族国家（中国、印度等）逐渐崛起的革命民族主义力量，这些民族可能点燃欧洲革命的火药桶。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逐渐了解和适应了这个世界，并通过制定策略，将民族主义转而为国际主义服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爱尔兰的“芬尼亚运动”。马克思认为这一运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且是“下层阶级的运动”⁹，他支持英国无产阶级与爱尔兰民族主义力量合作。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更深入地研究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认为民族独立运动必须在更广阔的国际主义视野中展开，并批判了普鲁东、巴枯宁和拉萨尔等人的狭隘观点和民族局限性。

¹ Walker Connor,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5.

²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6页。

³ David Felix, *Marx as Politicia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55.

⁴ Erica Benner, *Really Existing Nationalisms: A Post-Communist View from Marx and Engels*, p. 73.

⁵ Robert X. Ware, *Marx on Emancipation and Socialist Goals Retrieving Marx for the Fu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122.

⁶ 参见 Roman Szporiluk,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Karl Marx Versus Friedrich Li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0-42. 罗曼·斯波鲁克在该书中比较了马克思与李斯特的思想，分析了李斯特的保守经济民族主义，他认为事实上马克思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比他在民族主义方面写的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为明确。见该书第1页。

⁷ 参见叶险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现代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⁸ Walker Connor,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7.

⁹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4页。



韦尔指出：“所谓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不相容，是对两个相当模糊的‘主义’的简单混淆。”¹民族主义是指促进和发展一个国家或民族，而国际主义是为不同的民族的人民工作，或者说是促进跨国国家的合作。因此，民族主义只能是与“反民族主义”相对的，而不能把它与“国际主义”视为格格不入的范畴。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运动也是相辅相成的，人们往往共同致力于这两种运动，在国际合作的同时也不会否认自己的民族身份。罗曼·斯波鲁克（Roman Szporluk）认为要解决“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必须首先承认民族主义的力量：“事实上，当共产主义打败了敌对学说时，它的胜利至少要归功于采纳了部分民族主义的原则，以及它本身已经成为民族主义者的事实。”²可见，民族主义是促成国际主义必不可少的一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也有着相似性，例如，二者都植根于启蒙运动后的“进步话语”、都给流离失所者归属感、都利用了普遍自由的言论等。³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洛维将马克思、恩格斯归为“反民族主义”的，是因为他们拒绝将民族视为一个“无差别”的共同体，他们的最高忠诚不是任何民族，而是国际历史的主体（无产阶级）和目标（世界的社会主义的改造）。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时，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因此物质生产力还是首要因素，与之相对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都被置于上层建筑之内，民族主义被解释为一种历史现象，只是随着封建主义的消亡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才得以存在，它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因此，洛维指出经济主义和线性进步幻想（从启蒙时期开始）⁴，让马克思、恩格斯乐观地认为民族主义将会不可避免地很快衰落。由于忽视了“非阶级”形式（民族、种族或性别）的压迫，他们低估了民族解放的力量⁵。卡斯普扎克也认为马克思之所以不那么强调民族主义，一方面与他有反民族主义倾向有关，另一方面，写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不仅会承认民族主义是日益强大的力量，而且还意味着阶级和民族归属之间的斗争⁶。除此之外，洛维还认为虽然国际主义是基于具体、客观和物质条件的政治力量，但它“忽略了不同民族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不平衡发展的结果”⁷。他援引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话指出：“英国和印度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根本不是建立在他们的条件、任务和方法的同一性的基础上。”⁸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历史发展最终是趋向“普遍主义”的，但他们也从未忽视“差异性”的存在，同时肯定民族主义对民族解放的巨大作用。正如韦尔所言：“民族和阶级，一个方面的提升可能会与另一个方面的提升产生冲突，但它们是可能兼容的。”⁹民族联盟与阶级之间有着诸多相互支持的政治意志，如果国际无产阶级更亲密的合作的话，也需要平等和独立的民族，正如恩格斯所言：“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¹⁰

¹ Robert X. Ware, *Marx on Emancipation and Socialist Goals Retrieving Marx for the Fu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131.

² Roman Szporluk,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Karl Marx Versus Friedrich Li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5.

³ 参考 Michal Kasprzak,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rxist Nationality Policy from Marx and Engels to Lenin and the Communist Workers’ Party of Polan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2, p. 21.

⁴ 康纳也认为马克思过于看重经济因果关系，而忽视了民族范畴，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主义著作中的术语混乱，民族有时被指为国家总人口，有时被看作民族群体，还被认为是指代公民的基本法律概念。参见 Walker Connor,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9.

⁵ Michael Löwy, *Fatherland or Mother Earth? Essay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p.57.

⁶ Michal Kasprzak,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rxist Nationality Policy from Marx and Engels to Lenin and the Communist Workers’ Party of Polan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2, p. 21.

⁷ Michael Löwy, *Fatherland or Mother Earth? Essay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p.55.

⁸ Michael Löwy, *Fatherland or Mother Earth? Essay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p.57.

⁹ Robert X. Ware, *Marx on Emancipation and Socialist Goals Retrieving Marx for the Fu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125.

¹⁰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2年2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



阶级并不是区分社会群体的唯一方式，民族、种族和性别等维度都存在广泛的社会差异。很显然，用琼·考克斯（Joan Cocks）的话来说：“我们可以把对大规模的、非个人的〔普遍的〕历史力量的认识与对特殊性和差异性的欣赏结合起来。”¹ 恩格斯曾指出：“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²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肯定了波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还对波斯、中国、印度等东方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大力支持。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曾总结过马克思对印度和爱尔兰民族的不同分析，他指出，马克思观察到英国将爱尔兰农业产业的盈余转移到本国用于扩大工业生产，并严厉地指责英国的剥削使得爱尔兰陷入极度贫困³。在分析英国对印度的剥削时马克思指出：“那里的土地公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被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⁴ 正因世界资本主义造成的“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和残酷性，无产阶级面临着共同的剥削，有着一致的利益诉求，因此他们能够形成“国际联合体”。

国外学界围绕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展开的系列争论，推导出如下问题，让我们略做概括：第一，如何看待两种理论之间的差异性？“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在实践过程中不像哲学理论中划分得那样绝对，是相互影响、紧密缠绕在一起的。因此，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应当杜绝形而上学的单一划分，而要用辩证思维来审视。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革命年代，二者之间不可能有绝对的界限，他们一方面观察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审慎地规避极端的民族中心主义出现，同时又利用民族主义为无产阶级革命助力。第二，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的“普遍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世界主义思想，也称作国际主义思想，其理论内核就是普遍主义，但要在各民族国家获得民族解放之后，无产阶级才能联合起来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自启蒙时期以来的“普遍进步”的思想，是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把握民族主义问题，他们希望世界各民族实现自身的独立与解放，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联系。第三，如何看待无产阶级的差异性？无产阶级也是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各国无产阶级也具有自身的特性。马克思曾指出，“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国民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⁵。总之，无产阶级各具民族特性，又统一在革命斗争中。

四、结语：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主义思想的归纳

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主义理论的三大争论可以被总结为四个问题。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是非系统的、武断的还是一个完整的理论；第二，恩格斯的“非历史民族”理论究竟是否能推导出他是民族沙文主义者；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之间是否有分歧；第四，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是否存在“艰难的对话”。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我们进一步阐述如次。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三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著作中论述了三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其一，批判消极的民族主义，包括对法国和德国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批判，对德国保守的、自私自利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傲慢的、自大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斯拉夫民族反动的“泛民族主义”运动的批判⁶；其二，肯定积极的、革命的民族主义，

第 261 页。

¹ Joan Cocks, “Touché! Marx o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Vol. 11, No. 2, 1997.

²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第 410 页。

³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 and Internationalism”, *Monthly Review*, Vol. 52, No. 3, 2000.

⁴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584 页。

⁵ 马克思：《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王国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90 页。

⁶ 参见冯建勇：《民族原则如何影响国家疆界——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献的阐释》，载《世界民族》，2020



包括对波兰 1846 年、1863 年等多次民族起义的支持，对爱尔兰芬尼亚运动的肯定，以及对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声援等；其三，兼顾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将民族主义当作一种策略，“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作为阶级组织起来，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¹，在政治上是“国家体系范围”，但经济上是“世界市场范围”。马克思、恩格斯意思是要先在民族国家内部进行阶级斗争获得民族解放和独立，才能实现民族无产阶级的世界联合。马克思、恩格斯对待不同的民族主义采取不同的立场，所以会给人一种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是非系统、不连贯的错觉，但他们的一贯立场是利用民族主义运动为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事业服务。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主义思想的两种形态。国外学界讨论了两种形态的民族主义。其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其二，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民族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充斥着民族主义的时代，不可能不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方面，他们利用革命性的民族主义的力量为无产阶级国际战略服务，并反对德国保守、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侵略扩张；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德国民族哲学在世界上处于的领先地位，与鲍威尔兄弟将思辨哲学夸耀为世界哲学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客观评价德国哲学，马克思认为德国是一个哲学民族，恩格斯也认为德国是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并夸赞德国人淳朴的道德²。但他们坚持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³。虽然青年恩格斯在分析斯拉夫民族问题时曾有失误，但从整体上看马克思、恩格斯都在为促进世界民族的解放而斗争。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是“差异中寻求同一”。客观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整个革命时代中，相对更看重阶级（经济为依托）的力量，因此，有些忽视了民族主义的复杂性和这种思潮产生的背景环境。但国外学界的一些观点往往夸大了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的“普遍性”。“没有绝对的国际主义，也没有绝对的民族主义”⁴，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无产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⁵，全球各民族的差异性如此之大，即使要形成国际联合也一定会有“差异性”。马克思、恩格斯所反对的是资产阶级将“博爱、自由、平等”等西方“普世共和”的思想当作全人类的价值追求，他们要追求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爱”，是“共产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原则”，“除了政治平等的要求”，还包括“社会平等的要求……”⁶。

如上三大争论，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民族主义策略的灵活性，并根据不同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主义的现实性、复杂性和危险性，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自发力量也曾深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甚至青年恩格斯一度被它的激进力量所影响，因此后续他们对待民族主义十分的慎重，避免被它的消极力量反噬。他们深刻领悟了革命性的民族主义的动员能力，于是利用民族自发力量来为阶级自觉力量服务，推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世界历史的形成促进了世界各民族的普遍交往，暴力作为一种“恶”的力量虽然在人道主义上要受到批判，但它对民族融合产生了客观积极作用，用普遍化的力量来消解其特殊性，因此民族主义只是历史的产物终将被世界共产主义所取代，最终将随着人类解放的实现，新的自由人联合体将成为归宿。由此，我们能够比较系统地总结出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主义方法论的四大支柱，分别是：普遍进步的世界历史进程、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的策略主张、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的广泛动员、普

年第 4 期。

¹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438 页。

² 详见陈锐：《马克思主义对德国民族性的思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 年第 5 期。

³ 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第 257 页。

⁴ 郭树勇：《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 年第 12 期。

⁵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50 页。

⁶ 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庆祝 1792 年 9 月 22 日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第 662、667 页。



遍解放的最终目的。

第一，普遍进步的世界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进步哲学，它闪耀着“世界历史”思想的光芒，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叙事逻辑中不难看出“进步—痛苦”哲学的思维脉络，他们一直非常重视“暴力”¹所带来的客观进步意义。在处理斯拉夫民族问题时，恩格斯权衡了民族问题中的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由于过于看重“有生命力”的民族融合“残余”民族的进步历史作用，而忽视了弱小民族的生存价值。不过，在后续处理波兰、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时，两者之间达到了平衡。马克思、恩格斯也注意到如何对待“痛苦”²，正如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和布莱恩·麦基（Leszek Kolakowski and Bryan Magee）所言：“马克思试图理解人类的冲突、痛苦和缺乏理解是如何植根于生活的物质条件的，特别是人类为生存而斗争的方式。”³民族主义力量催生的“民族自决”是与阶级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匹配的，不能违背历史规律强行进行民族融合，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一切私有制后，民族大融合才可能实现，那时才会消除掉一切民族压迫的痛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

第二，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的策略主张。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思想包括“两个联合”，即“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和“自由人联合体”，它表征“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双重维度，在他们看来民族解放是阶级解放的前提，阶级解放又是人类解放的必要环节。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工人没有祖国”⁴是指理性看待民族主义中所蕴含的危险成分，不要受到狭隘的、阴暗的民族利己主义影响。实际上，积极的民族主义是国际主义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各国的无产阶级要通过暴力革命上升为民族阶级，才能夺取政权，建立起自己的政党，消灭一切阶级对立，进而形成联合的力量，最终实现人类解放。就像洛维所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只有无产阶级作为一个不再是民族、具有共同的世界历史利益的普世阶级，才能建立一个能够克服民族差异的普遍社会。”⁵总之，无产阶级的民族性就是世界性，它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声援世界上一切受压迫的民族。

第三，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的广泛动员。民族主义盛行的19世纪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他们致力于利用革命民族主义的力量铲除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实现世界民族的广泛团结。他们判断民族主义运动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一切都要服从于革命的利益。革命的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利益是一致的，当爱尔兰爆发芬尼亚运动时，马克思看到了这一运动的三个特性：一是爱尔兰拥有天然的独立权利，二是这一权利只有通过武装革命才能获得；三是扎根于人民群众⁶。他坚定的指出：“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是把现存的强制的合并，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成平等自由的联盟……”⁷。总之，广泛的

¹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反杜林论》等多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强调“暴力”（战争、掠夺、殖民等）作为一种“痛苦”的力量所带来的客观上的进步意义。例如，奴隶制虽然在人道主义立场上要受到谴责，但它确实推动了世界历史进步，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详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8页。

² 详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0页。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即使深刻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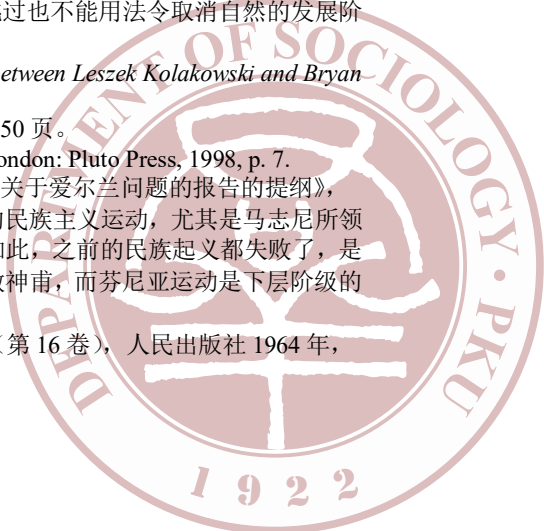
³ Leszek Kolakowski and Bryan Magee, *The Philosophy of Marxism: A Dialogue between Leszek Kolakowski and Bryan Magee*, Bath: Ashgrove Press, 1987, p. 90.

⁴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2、50页。

⁵ Michael Löwy, *Fatherland or Mother Earth? Essay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p. 7.

⁶ 详见马克思：1876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06页。之前的民族主义运动，尤其是马志尼所领导的民族运动，均以失败告终，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脱离人民。爱尔兰也是如此，之前的民族起义都失败了，是因为领导人民的不是贵族，就是资产者，而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有天主教神甫，而芬尼亚运动是下层阶级的运动。

⁷ 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41页。



革命动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因为它确保了整个世界的最终普遍解放。

第四，普遍解放的最终目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力量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将其称为“虚幻的共同体”，因为它无法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它催生了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通过贬低其他民族来证明自身的进步性，通过沙文主义的侵略获得私利。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民族平等将无法得到保障，人的先天偶然性将会成为他后天的必然性，民族或种族歧视问题泛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了“自由人联合体”这样的“真正共同体”，当民族国家消亡和阶级对立消失之后，民族主义的情感就会成为“多余”的成分，每个人都是人类的一分子，都实现了充分的发展，“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呼唤，因此，整个过去的历史只有在这最后的解放中才能被理解”¹。

【论 文】

论马克思恩格斯对 19 世纪德法两国“自然疆界论”的剖解²

于逢春、冯建勇³

内容摘要：自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开始，法国历代统治者多以鼓吹与实践“自然疆界论”为己任。同时，德、俄等一些对他国领土野心的强国也利用该理论，主张应以对自己国家安全有利的大山、大河等作为其自然分界线。后来，该理论又披着“民族原则”的外衣，渐渐异化为欧洲大国侵略和霸权的道具。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层层揭底，深刻剖析，最终使其无所遁形。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自然疆界论；《萨瓦、尼斯与莱茵》；《波河与莱茵河》

一、引言

早在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便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规划》（《Le Grand Dessin》）：“使哈布斯堡王室降低到比利牛斯半岛一个国君的地位，把土耳其人和鞑靼人赶到亚洲去，重建拜占廷帝国，然后再重画整个欧洲地图。欧洲将分为六个世袭君主国家、五个选举的君主国家和五个共和国。在这一切国家之上，设置一个专门的议政府，负责维护普遍和平并审理国与国之间、国君与国君之间的一切纠纷。基督教国家的这种特种共和国的首脑是教皇，其首相则为法国代表。”⁴在此背景下，亨利四世于 1601 年曾对新征服的比热和布雷斯等地区的居民说了一段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话：“既然你们历来都讲法语，你们理应是法兰西王国的臣民。使用西班牙语或德语的地方，我赞成分别留给西班牙和德国，但使用法语的地方应归我所有。”⁵肖忠纯认为这是法国“自然疆界论”的肇端。⁶张世明认为，总体上而言，“亨利四世以及黎利的

¹ Leszek Kolakowski and Bryan Magee, *The Philosophy of Marxism: A Dialogue between Leszek Kolakowski and Bryan Magee*, Bath: Ashgrove Press, 1987, p. 90.

² 本文刊载于《中州学刊》2014 年第 1 期。

³ 两位作者均为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教授。

⁴ 波将金等编，史源等译：《外交史》第 1 卷（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第 341 页。

⁵ Auguste Longnon, *De la formation de l'unité française. Leçons professées au Collège France en 1889-1890*, A. Picard, 1922, p. 325.

⁶ 肖忠纯：《论近代法国对外政策的扩张性》，《世纪桥》2007 年第 4 期。

